

清代 陆王学研究

杨朝亮
著

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陆王学研究 (10BLS004)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本书的研究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陆王学研究（10BLSJ04）”的支持

清代陆王学研究

杨朝亮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陆王学研究 / 杨朝亮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28-0364-8

I. ①清… II. ①杨… III. ①陆王学派—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2068号

清代陆王学研究

杨朝亮/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2 千字

2015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64-8 定价: 21.00元

目 录

清初陆王学之历史命运	(1)
论李绂的生平与学术	(18)
浅析清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李绂	(36)
李绂学术思想渊源探析	(49)
《陆子学谱》初探	(65)
《陆子学谱》之架构与旨趣	(84)
《陆子学谱》撰述之意义	(123)
试论李绂于三礼馆之贡献	(140)
浅析乾嘉汉学下的陆王心学	(154)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177)
余姚邵氏王学思想之主旨	(191)
从《学约》《学记》看梁启超陆王心学思想	(238)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5)

清初陆王学之历史命运

明末清初,王阳明心学崩解,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由王返朱”的声浪。一时学者多对陆王心学持否定态度,认为“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学。王学因之成为众矢之的,抨击王学、推尊朱子,逐渐成为一种风气。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经陆陇其辈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以朱学获官卿相而推波助澜,遂有康熙朝日渐隆盛的崇奖朱学之举。尽管如此,陆王心学并没有成为绝学,它依然按其内在逻辑向前发展。

一 清初统治者的基本政策

顺治一朝,战火未熄,清廷以军事征伐巩固统治,乃大局所在。于文化建设方面,诸如采取了“临雍释奠”,鼓励太学生笃守“圣人之道”^①;诏谕礼部把“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宣称:“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

^① 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上),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95年。

太平。”^①又举行经筵盛典,于弘德殿祭祀孔子等。但总体而言,于文化建设方面尚无暇过多顾及。也正是由于没有过多的时间来关注文化,所以,顺治一朝,陆王心学亦和程朱理学一样被统治者所认可。顺治二年(1645),“钦定王守仁、陈献章、薛瑄、胡居仁等配飨孔庙”^②。顺治十四年,“郑锡元发起重修姚江义学活动,经史孝咸提议,义学正式题名为‘姚江书院’,参与其事的有邵之詹、赵不疑、邹汝功、邵鲁公、吕梅夫、陈蜀庵、钱伏吾、邵得愚、史季述、邵安元、俞吾之、史显臣等。郑锡元作《重修姚江书院告沈先生文》”^③。由上可见,顺治一朝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以,也同其他各朝初建一样,于各种思想文化皆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因此,陆王心学亦同程朱理学一样,在清顺治之时亦能得以发展。

圣祖亲政后,统治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圣祖作为一个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杰出封建帝王,极为尊崇儒学,他以“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六年(1667)圣祖亲政,两年之后清除鳌拜,使其文化建设走上正轨。八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次年八月,恢复翰林院;十月,又提出以“文教是先”的十六条治国纲领;从十一月起,相继举行“日讲”和“经筵”大典。康熙十七年(1678)一月,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④于是,诏举“博学鸿儒”,罗致天下名士,经过次年春天的考试,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院供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本纪五,《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 俞樟华:《王学编年》,世祖顺治二年(1645)条,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③ 俞樟华:《王学编年》,世祖顺治十四年(1657)条。

④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志八十四,《选举四》。

职。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天,圣祖南巡返京途中,到孔子故里曲阜拜谒孔庙,于大成殿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亲书“万世师表”,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及孔子后裔孔尚任等讲论儒学。由此,也标志着康熙一朝文化政策的最终确立。

康熙帝这一政策的最终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从学习到体认、到最终形成的过程。清圣祖经过长期的学习体认,最终确立朱子学为官方哲学,但在学习程朱思想学术的同时,自然也接触到了陆王心学。他自己就曾说“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可见其于陆王学术亦有研究。如果说康熙帝对陆王学术没有研究的话,也不会出现像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和二十六日两次与主张王守仁心学的大臣崔蔚林进行问答,道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似”^①之语。

还有最为典型的是翰林学士李光地,在诸大臣中对康熙帝的影响是较大的。作为一位从科场角逐中跻身仕途的士人,他是从学习“四书”开始的,但他在学习“性理之学”^②的同时,又“看陆王之书及诸难书”^③,尤其是陆九渊、王守仁的著述,曾一度深深地吸引了他,为此用了整整五年的工夫^④。后来,圣祖曾当众指斥他为“冒名道学”^⑤,把他归入廷臣中的王学派。诚然,崔蔚林、李光地辈皆被康熙帝予以指责和批判,但这一事件至少说明:其一,在当时的朝臣中,不仅仅有程朱理学者,而且有陆王心学者。其二,陆王学者的存在,他们的学术不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十八年(1679)二月二十六日条,中华书局1984年。

② 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全书》第十册,《榕村谱录合考》卷上,十八岁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③ 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全书》第十册,《榕村谱录合考》卷上,二十五岁条。

④ 参见李光地著,陈祖武点校:《榕村语录 榕村续语录》卷十六,《学》。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二十八年(1689)五月初七日条。

能不影响到康熙帝,而对崔氏、李氏的指责和训斥,皆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倾向,而是他们的行为。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亦可考见清初统治者于陆王心学的态度。邵廷采于“康熙初,从毛奇龄游。主讲姚江书院十七年”^①。康熙二年(1663),“施璜接替汪佑主持还古书院和紫阳书院讲会”^②。康熙五年,“贵州水西建开元寺,寺中有王公祠,奉祀王阳明”^③。康熙十二年,“贵州巡抚曹申吉捐资重新建筑阳明书院,落成后,置图书千余卷于其中”^④。康熙二十二年,邵廷采等推荐史标主持姚江书院^⑤。康熙三十六年(1697),王材成“任江西南康知县,建阳明书院”^⑥。康熙五十四年(1715),“绍兴知府俞卿重修王阳明墓”^⑦。如果仅仅从上述史事来看,不可能看出康熙帝对于陆王心学采取禁锢的态度,反而给人一种陆王心学在清初仍然得到统治阶级认可的印象。

清初出现过几次大的文字狱事件,细细分析,亦值得深思。例如毛重倬案,顺治五年(1648),大学士刚林举发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文字中沿用南明年号,这在当时是关于正统的严重问题,结果毛重倬被处以极刑。又如庄廷鑑《明史》案,庄氏一心想学左丘明编写一部传世的史学著作,花重金购买明朝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再加以整编修补,又遍访江浙一带名士“列名参阅”,以壮大声势,为之刊刻。但在叙述史实时仍沿用南明隆武、永历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

① 俞樟华:《王学编年》,世祖顺治五年(1648)条。

② 俞樟华:《王学编年》,圣祖康熙二年(1663)条。

③ 俞樟华:《王学编年》,圣祖康熙五年(1666)条。

④ 俞樟华:《王学编年》,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条。

⑤ 俞樟华:《王学编年》,世祖顺治三年(1646)条。

⑥ 俞樟华:《王学编年》,《附:1677年至1911年有关王学的人事》。

⑦ 俞樟华:《王学编年》,《附:1677年至1911年有关王学的人事》。

书中还涉及满族先祖旧事,因此,出版发行后,被人告发。康熙帝痛下杀手,庄廷鑑剖棺戮尸,家庭成员中十六岁以上男子皆斩,女子发配边疆,牵连者数百人。

清初文字狱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原因。1644年,顺治帝取代明朝而王天下,具有浓厚传统的汉族百姓从骨子里是无法接受的,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更是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反抗心理。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乾坤反覆,中原陆沉”,社会将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华夏”之族将被“夷狄”所统治。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而出现,并与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事件结合在一起,使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极大威胁。文字狱事件便是在这一情形之下作为一种镇压反满情绪的工具而产生。因此,可以看出,文字狱事件的出现主要是针对汉人的反满情绪,而并非上升到具体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总之,清初统治者于思想文化领域内,虽没有像对程朱理学那样对陆王心学进行表彰和鼓励,但对陆王心学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排挤和压制,而是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态度。

二 清初诸大儒的学术努力

明末清初,王阳明心学崩解,一时学者多对陆王心学持否定态度。面对清初学术界的质疑,尤其是朱门后学对陆王心学的否定,王学大儒如孙奇逢、黄宗羲、李颀等,则以学术史编纂的努力,积极去为陆王学术奔走呼号,维护其学术正统地位。

孙奇逢治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

用伦常为实际”^①。他早年信奉王阳明心学,曾说:“阳明是说心之体,非说性之体也。继善成性,性自是善。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可谓皆善乎!此只在阳明自信得及,我辈何庸代为置辩耶?”^②他认为“心”和“性”其实是一体的,天命之“性”,只在人们心中,“性”本来就是善的,“心”则没有善恶之分。这正是王阳明的心性一元论。

孙奇逢认为程朱、陆王之学,实际上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极力合朱、王于一堂。因此,他著《道一录》,“以证夫道之一”^③。他还认为:“朱、王入门,原有不同,及其归也,总不外知之明、处之当而已。”^④他说:“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⑤“两贤之大旨,固未尝不合也。”^⑥他还曾说:“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⑦

孙奇逢历时三十年,著成《理学宗传》,凡二十六卷。是书以北宋五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理学大师共计十一人为宗主,辅以汉唐宋明诸儒考,共计一百四十六人。孙奇逢通过对宋明理学史(其中也有汉唐诸儒,但该书是以宋明诸儒为主)的梳理总结,试图寻找出儒学发展的新途径。他利用《周易》“元、亨、利、贞”的循环轨迹,来归纳数百年间的理学发展史,认为:“盖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并且断言:“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可见,孙

① 清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孙奇逢》,中华书局1987年。

②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道一录序》。

④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二,《答常二河》。

⑤ 徐世昌著,陈祖武点校:《清儒学案》第一卷,《夏峰学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

⑦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

奇逢从儒学道统观出发,为王阳明学术争正统,肯定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的道统传人。

孙奇逢著成《理学宗传》后,曾寄给黄宗羲。两人南北遥相呼应,唱为同调。也正是在此时,黄宗羲结撰《明儒学案》一书。是书六十二卷,卷首列“师说”,上起明初方孝孺,下至明末许孚远,区分类聚,按时间先后,列十九学案,对有明一代二百余名儒者的生平及思想特点加以梳理和评论,揭示了明代二百余年儒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使一代学术源流得以明晰地展现出来。

黄宗羲为学之始,初从王守仁、刘宗周入,后经历明清易代,他将王守仁、刘宗周之学廓而大之,逾越心性之学樊篱,而立足于“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①主张合学问与事功为一,以期“救国家之急难”。黄宗羲之学出于王守仁,于学术思想上,他具有明显的“尊王抑薛”倾向。他在《明儒学案》一书中的“姚江学案”中指出:“有明学术,白沙(即陈献章——引者注)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其所论述,以王阳明为正统,说:“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②他赞成陆、王“盈天地皆心”的心性观,认为人既禀气而生,人身便具备万理,因而可以不假外求。

正因为黄宗羲对王学的尊崇,所以《明儒学案》中所收学者及其学术观点和思想渊源,无论其内容还是其分量,都是以王守仁为中心。反映王学的除了王守仁的《姚江学案》之外,还有论述王门后学的《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

①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第三册,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

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而《止修学案》《泰州学案》也属于王学系统，只是稍有变化。因此，王门学案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

诚然，黄宗羲的王学与王守仁当年所传王学已有很大不同。黄宗羲尽管被人目为王学嫡派，但是，他对于明末王学之流弊，则是极力克服。他曾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正因如此，黄宗羲才提倡学者读书。他还批评“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①。认为学者不仅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事理，把握其变化。不然，则抱残守缺，见识难广。在“读书证理”的同时，他还主张“求理于心”，认为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②。由此可见黄宗羲学术的王学属性。

黄宗羲在完成《明儒学案》之后，就准备编写《宋元学案》一书。他收集资料，撰文作序，但未竟而卒，仅成十七卷。其后，由其子百家以及私淑弟子全祖望等增补，经过后人的校勘补正，最后将全书正式厘定为一百卷，遂成今本。此书将宋元两代的学术思想，按照不同的流派加以系统的总结，书首置“序录”，使人概见大略，对两代的学术流变了如指掌。以下分列安定、泰山、高平、庐陵、古灵、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等学案；又立新学、蜀学、屏山诸略；最后列与两宋道学兴废相关的元祐、庆元党案。总体而言，黄宗羲对于朱陆学术之态度，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可以窥得一二消息。在本卷案语

① 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中,其对朱陆学术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从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黄宗羲是持调和态度的。

关学领袖李颀则认为,人必须“存心复性”,说:“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大事,焉用著述?如其未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乃学人通病。”^①强调“明己心”,“见己性”,不断反躬自省,去除“物诱”,恢复“良知良能”。只要这样,无论资禀高下,皆可成为圣贤,处事无不咸宜。他公开表彰王守仁的“致良知”说为“千载绝学”,指出:“人若无良知,则满身成僵尸,安能视听言动?”^②又说:“阳明出而横发直指,一洗相沿之陋,士始知鞭辟著里。”^③与之相一致,李颀极力反对“舍本趋末”,说:“能先立乎其大,学问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若舍本趋末,靠耳目外索,支离葛藤,惟训诂是耽,学无所本,便是无本领。即自谓学尚实践,非托空言,然实践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则其践为践迹,为义袭,譬诸土木被文秀,血脉安在!”^④

李颀还认为“明体适用”是儒家的传统。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⑤如何才能“明体适用”呢?李颀认为应当从读“明体适用”之书开始,说:“故体,非书无以明;用,非书无以适。欲为明体适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否则纵诚笃虚明,终不济事。”^⑥随之,李颀开列了一系列“明体”“适用”之书。在“明体”类中,第一部为陆九渊

① 李颀:《二曲集》卷十六,《答徐斗一第二书》,中华书局1996年。

② 李颀:《二曲集》卷三,《常州府武进县两庠汇语》。

③ 李颀:《二曲集》卷十六,《答张敦庵》。

④ 李颀:《二曲集》卷四十二,《孟子下》。

⑤ 李颀:《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问》。

⑥ 李颀:《二曲集》卷十六,《答王天如》。

的《象山集》，他说：“先生在宋儒中，横发直指，一洗诸儒之陋；议论剖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①对陆九渊可谓推崇备至。其后，即是王守仁的《阳明集》，李颀奉王守仁之学为主臬，认为：“其书……句句痛快，字字感发，当视如饮食裘葛、规矩准绳可也。”^②对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李颀更认为是“千载不传之秘”，说：“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③继陆王之后，李颀依次开列了王畿的《龙溪集》、罗汝芳的《近溪集》、杨简的《慈湖集》和陈献章的《白沙集》。李颀在这些书目之后，特别注明“右数书，明体中之明体也”^④几个字，可见其用意。

当然，李颀之学虽出于王守仁，但并不持门户之见，曾说：“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原。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⑤他教学者入手功夫，说要先观陆九渊、杨简、王守仁、陈献章之书，阐明心性，“以洞斯道大原”，然后取程颢、程颐、朱熹以及吴与弼、薛瑄、吕柟、罗钦顺之书，以尽践履之功。他在对“明体”类书目所作案语中也强调这一观点，其中语：“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后阅程朱诸录及康

① 李颀：《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② 李颀：《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③ 李颀：《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④ 李颀：《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⑤ 李颀：《二曲集》附录二，《二曲先生窆石文》。

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①

李颺认为,朱陆学术各有所长,不应当“抑彼取此”。他曾说:“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中最为倣切,令人于言下爽畅醒豁,有以自得。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轻低昂者也。”^②又指出陆、王之弊在“空寂”,程、朱之弊在“支离”。因此,他不赞成当时方兴未艾的“辟陆尊朱”之风,认为:“今人亦知辟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谓尊,不过训诂而已矣,文义而已矣。其于朱子内外本末之兼诣,主敬提躬之实修,吾不知其何如也。”^③由此出发,李颺主张合会朱王,并提出了“学问两相资则两相成,两相辟则两相病”^④的深刻见解。总之,经历明清更迭的政治变动,李颺满怀家国之痛,立足王学,会通朱陆,以“明体适用”学说和“道学即儒学”的主张,重倡儒学经世传统,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积极的修正。

综上所述,陆王学术到了明末清初,已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王学“空谈误国”,成为一时学者舆论的主流所在。王学大儒孙奇逢、黄宗羲、李颺等先后通过著述,以之来维护陆王学术在封建儒学中的正统地位。但是,由于清廷统治政策的导向,以及社会现实使然,陆王心学于清初并没有出现兴盛的局面,依然处于低潮时期。

① 李颺:《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

② 李颺:《二曲集》卷四,《靖江语要》。

③ 李颺:《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④ 李颺:《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三 陆王学术之最后重镇——李绂

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圣祖颁谕,将朱熹在孔庙中的从祀地位升格,由东庑的先贤之列,提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这标志着朱子学正统地位的树立,同时,清初的文化政策也最终确立。随着朱子学地位的提升,陆王心学则趋于衰微。在此困难情形之下,李绂崛起,承前启后,一生致力于陆王学术之表彰,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全论》诸书,成为陆王学术之最后一个重镇^①。

李绂意识到作为一介学者,“躬行实践可矣”,而在中国历史上注重躬行实践者莫过于宋代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二人。但是,李绂又认为陆王思想也不是都有益于治道,还必须对其进行修正之后才能够切于世用。要想张扬陆王心学,在当时思想环境下就必须讲明朱陆之关系,朱陆之间的关键问题即是朱陆之辩。于是,李绂著《陆子学谱》一书,为陆王心学争正统,大力宣扬陆九渊躬行实践之思想。所以,四库馆臣评价《陆子学谱》说:“是编发明陆九渊之学,首列八目:曰辨志、曰求放心、曰讲明、曰践履、曰定宗仰、曰辟异学、曰读书、曰为政,次为友教,次为家学,次为弟子,次为门人,次为私淑,而终之以附录。考陆氏学派之端委,盖莫备于是书。”^②可见,《陆子学谱》确为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陆子学谱》以黄宗羲《象山学案》稿为基础,充实增订,独立成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第七章,李穆堂,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八,《子部》,《儒家类存目》,《陆子学谱》条,中华书局1965年。

编,在学案体史籍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同时,不仅对其有所补助,而且更具系统性,从而彰显了陆学一系的学脉。《陆子学谱》的编纂原则,从卷首“序”中可窥见一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熹著《近思录》和《伊洛源渊录》,二书把“言”与“行”分而为二,李绂认为这有违孔孟之宗旨。另外,“求先生(即陆九渊——引者注)之教者,或分言与行而二之,岂有当哉”^①。有鉴于此,李绂认为绝对不可以把“言”与“行”分开,因此,《陆子学谱》一书不可不作。其次,世人以为陆九渊之教“无方”,但李绂认为,作为后学,要想得其奥秘,“则不可以无其方也”。李绂著《陆子学谱》也是为给后人指明一条入门途径。再次,李绂还认为,陆九渊的学术宗旨尽管“思虽无穷”,但“渊源所及,确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不可得而诬也”^②。也就是说陆九渊的学术渊源也是非辨不可的。所以,李绂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经过长期的考证辨别,才“敢抄撮先生绪言,并其教思所及,共为一书”。最后,李绂于此也谈及其著述的终极目的,称:“将以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俾有志于希圣者,门径可循,归宿有所,不沉溺于纷华,不泛滥于章句,庶几斯道有绝而复新之日矣乎。”^③李绂还讲道:“若道听途说之流,未尝身习其事,咕咕然劫其喙,所不计也。”^④李绂料到,此书一出,肯定会遭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指责或反对,所以,他首先声明对于这些是不会计较的。

遵循上述原则,《陆子学谱》凡二十卷共分六个部分,每部分都可

① 李绂:《陆子学谱》卷首,序,子部第27,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5年。

② 李绂:《陆子学谱》卷首,序。

③ 李绂:《陆子学谱》卷首,序。

④ 李绂:《陆子学谱》卷首,序。